

# 中国应用人类学的过去、现在与将来

石奕龙

一般而言,应用人类学是指在承认人类社会文化是不断向进步方向发展的前提下,把人类学家对人类、文化、社会和认识和知识应用于改善人类社会文化现状和促进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学科。它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主要偏重于应用研究,但也不排斥一些理论性的研究。

## 一

人类学是一门在西方发育生成的学科,它包括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分支。后者则主要包括民族学、考古人类学与语言人类学。本世纪初,人类学开始传入中国。1903年(光绪廿九年)北京大学堂书局出版了林纾(琴南)与魏易合译的《民种学》,该书原为德国人哈伯兰所著,主要介绍北美、大洋洲、亚洲、非洲以及欧洲的一些民族,1898年出版,1900年美国人类学家罗维把它译成英文,名为《民族学》,林、魏二人即根据此译为中文,第一次把人类学的著作引进中国。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堂也于该年在中国首次开设“人类学”科目,人类学从此开始进入中国。但是,在引进人类学以后的最初20多年(1903——1927年)间,虽然蔡元培先生在1926年发表的《说民族学》一文中,也提倡民族学不仅仅是理论的科学,而且也应是应用的科学,不仅与学术有关,而且与实际政治如边政边教的推行、民族文化水准的提高都有关系。<sup>[1]</sup>然而,这一时期重要的还是引进国外人类学的各种理论、方法等,如1924年许德珩译了法国社会学派杜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等;同时也有人开始用国外人类学的理论作为解剖中国社会的利器,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一些社会文化现象,如刘师培认为《礼》中提到的阳候杀穆候并劫其夫人之事是古代掠夺婚的遗迹等,都是明显的例子,不过,就这段时间而言,还没有所谓的应用人类学可言。

从1928年到1949年左右,中国人类学开始形成一支队伍,一方面中央研究院于1927年成立了民族学组,后添设体质人类学而改为人类学组;国内的一些大学也开始有人教授人类学。另一方面,与人类学有关的学会,如中国民族学会也于1934年宣告成立。这个时期的人类学研究也有较全面的发展,一方面继续把国外人类学各学派的理论介绍进中国,如这一时期李安宅译了古典进化论学派学者弗雷泽的《交感巫术的心理学》(商务印书馆,1931年),杨东莼、张栗原合译另一位古典进化论者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35年);吕淑湘译了美国历史学派学者罗维的《初民社会》(商务印书馆,1935年)、《文明与野蛮》(生活书店,1935年),钟兆麟译了历史学派另一学者韦斯勒的《社会人类学概论》(世界书局,1935年),杨成志译了历史学派创始人波亚士的《人类学与现代生活》(商务印书馆,1945年);费孝通译功能学派大师马林诺斯基的《文化论》(商务印书馆,1944年)及裴司的《人文类型》(商务印书馆,1944年)等。另一方面也开始了中国人类学家的实地调查,并撰写一批报告与论著来,如1928年颜复礼、商承祖赴广西凌云调查瑶族;1929年林惠祥赴台湾调查高山族;1930年凌纯声、高承祖赴东北调查赫哲族;1932年凌纯声、芮

逸夫调查浙江畲族；1934年凌纯声、陶云逵调查云南彝族等。而在人类学著述方面，这时期也有不少概论性著作与专论出版，如1929年出版蒋由智的《中国人种考》等；1930年出有斐文中的《中国猿人化石的发现》、张作人的《人类天演史》等；1931年出有吴金鼎的《山东人体质的研究》、张栗原的《现代人类学》等；1932年出版了吴泽林的《现代人种》，刘敏的《人类学体系》，林惠祥的《世界人种志》；1934年出有林惠祥的《文化人类学》；1943年出有费孝通的《禄村农田》，张子毅的《易村手工业》；1946年出版了史国衡的《昆厂劳工》，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1947年出有林耀华的《凉山夷家》等。而且由于人类学的正常蓬勃发展，应用人类学也在这个时期开始受到中国人类学家的重视。1934年，吴泽霖先生在《东方杂志》第31卷第18号上发表《民族复兴的几个条件》一文，运用人类学的观点简略地分析了民族复兴的条件，并认为“如能对症下药，毅然决然地彻底进行改革，才是民族的出路”，大力提倡人类学的应用研究。1935年英国功能学派的另一位大师拉德克利夫——布朗应吴文藻之邀访问中国，在燕京大学讲授“比较社会学”，他认为，“许久以来，人类学即呼号应用此种科学于实际殖民地治理之需要。关于英国，人类学之实际应用已采用有相当步骤，政府对各殖民地皆派有人类学专家佐理殖民地行政，并训练殖民地服务人员。”十年来，余曾实验一种课程，包括普通比较社会学之全部，继之以实地作文化之功能的研究，再辅之以殖民地行政政策及方法之比较研究。如斯实验未及一年已发现其能充分适合学生之需要，即可供给学生以统制、教育土著之科学的基础。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地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之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有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sup>[2]</sup>他也大力提倡应用人类学的研究。在这种思想推动下，燕京大学也比较注重于应用研究，所有这些都为40年代应用人类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进入40年代后，中国的应用人类学有了初步的发展，在拉德克利夫——布朗对于中国农村生活社会调查的建议”的推动下，加之在抗战期间，政府迁至西南，对西南的少数民族问题比较重视一些，故这一时期，应用人类学的研究几乎都集中于西南地区，一方面这派生出所设的“边政学”的研究，即“研究有关民族政治思想事实，制度及行政”，目的除了探究有关人口移动、民族接触、文化交流与社会变迁的法则之外，还可以使“边疆政策有所依据，边疆政治得以改进，而执行边政的人对于治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边民，亦可有所借镜”，并希望战后建设一个“实行允许国内各民族地方自治的偕享”<sup>[3]</sup>的民族国家。另一方面也从事一些“对文化变迁和就用人类学真正问题进行学术上攻关”的应用研究，如禄村、易村、昆厂、玉村等旨在“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sup>[4]</sup>的西南汉族的研究，都可以属于此类。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当时人类学家的主观意愿是好的，也做了不少应用研究的努力，然而，由于当时的政治背景，因此在国统区中的应用人类学研究的一些理想目标虽有进步意义，但却无法达到和实现。只有在当时的另一个政治中心——延安，由于中国共产党强调把文化人类学理论与中国社会文化问题的实际相结合，并对北方有关的民族展开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因此这些应用研究的结果直接影响和参与了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并直接参与藏、回等地区民族自治的实际过程，使人类学的应用真正地发挥了作用，并影响了新中国的应用人类学的发展。

## 二

1949年以后，中国发生了巨大的政治变革，新中国诞生了，这使得中国人类学发生了

很大的转变,应用人类学也相应有一段时间的蓬勃发展。首先是民族识别工作,即对民族成分的识别与确定。这项工作大约从1950年开始,大批人类学家参与其中,他们运用人类学的知识,以共同的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文化上的心理素质以及共同的历史文化等主要因素为标准,既尊重本民族的意愿,实行“名从主人”的原则,又通过文化人类学的实地调查研究,对所获资料进行缜密的科学分析和论证,重点考察各民族共同体的客观形成过程及其自我意识的实际现状,以帮助各少数民族对自己的族别作出正确的判断,并由他们自己考虑采取哪种族称。通过大量艰辛、复杂的研究与分析工作,以及同各少数民族协商,从几百个自报的民族名称中逐渐排除了民族称谓的他称、重复自称、民族支旁系名称、各种汉语译名,以及地名、区域性的称谓等。到1956年,由国家公布了51个得到确认的少数民族,以后又增加到55个少数民族。从而为直接为国家了解国内各民族的基本构成与民族关系的基本性质,以及为以民族区域自治为中心的民族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并且因此也取得了许多独到的经验。

其次则是参与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这大约是从1956年开始。首先从事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它以各民族社会经济为主展开,同时也涉及到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婚姻家庭、社会组织、语言文字、政治法律、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等,一方面积累了不少民族志资料,做了不少民族学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另一方面也把研究成果应用于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革的实践中,如对各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调查资料和研究报告,直接被决策机关应用于制定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上,以造福各民族人民。又如对各少数民族及至其各支系的社会性质或社会发展阶段的调查研究,也直接为国家根据不同民族的各自特点,分别采取不同形式的民主改革方案,提供了有效的咨询,有的甚至介入政策的制定以及实施过程,从而使各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变革,根据实际情况,实施不同政策,采取不同途径与方式,以达到共同的社会主义改造目标,平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中。

但是,自50年代后,由于把人类学等视为资产阶级学科而遭到了否定,人类学的有关研究只在古人类学与考古学领域中还有所发展。其各方面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应用人类学就更不必说了,也得不到相应的和应有的发展。这种现象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有根本的改变。尤其是在1980年成立了中国民族学学会以及1981年成立了中国人类学学会以后,人类学在中国大地上再次得以提倡与恢复,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步入一个新的阶段。与此相应,应用人类学也随之生机勃勃地得以恢复与大踏步地发展。其表现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确立了现阶段的人类学研究,不仅要注重理论研究、基础研究,而且也要注重应用研究,以解决现实问题的战略,并以此为指导而行动。1982年中国民族学学会以“民族学与现代化建设”为中心议题,召开了其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中国人类学学会也于1983年11月以“人类学与两个文明”建设为中心议题,在上海召开它的第二届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并于1985年9月在成都以“人类学的应用”为中心议题,召开第三届全国人类学学术讨论会。所有这些都表明和强调在恢复和发展中国人类学事业时,应把人类学的应用实践摆在重要的位置,从而使应用人类学的研究日益成为人类学的主流之一,因为人类学的应用是人类学的特点之一:不管体质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都具有这种应用的特点。近几十年来,国外人类学蓬勃发展,正是人类学广泛应用的结果和证明,因此,我国在恢复提倡人类学中,也必须强调人类学的应用。

其次,在新时期中,也重视引进一些国外新的应用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并力图加以批判地继承,对其消化、改造、创新。1981年底武汉请美国应用人类学家辛格顿来鄂讲授应用人类学,其讲稿也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3月,中国人类学学会同厦门大学人

类学系联合举办“应用人类学培训班”，请美国阿拉巴马州立大学黄树民教授，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讲授应用人类学等课程。1987年，厦门大学人类学系译出美国马里兰大学帕克学院的应用人类学家钱伯斯的《应用人类学：实践指南》一书，油印给人类学系专业的学生作参考。1988年，厦门大学人类学系为本科生开出“应用人类学”课程，介绍了应用人类学的主要范围、应用研究的理论与基本原则等。此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也开出应用人类学课程，为学生介绍应用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情况。1992年，厦门大学人类学系还承担国家教委“八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重点项目：应用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目前正在撰写《应用人类学》一书。此外，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的谢剑博士也于1989年根据钱伯斯与威灵根的应用人类学教科书编著了国内第一本应用人类学教科书，由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989年10月），四川人民出版社也于1990年10月出版该书，但书名改为《理论与实践：当代应用人类学简介》。

其三已有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参与到应用人类学的实践之中。由于这一新时期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时期。一方面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开放改革在各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生活中产生了一系列变化；另一方面，由于过去政策的某些偏差所造成的潜在矛盾也日益显露出来，因而与民族地区经济建设与现代化过程有关的这些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就显得特别突出。因此，人类学的应用研究除了民族识别仍有延续外，重心大都偏在与经济建设有关的应用研究课题上。例如199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的课题指南以“民族问题研究”栏中共有十一项，其中应用研究的课题就有“少数民族地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研究”；“不同类型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对策研究”；“九十年代少数民族地区乡镇企业发展的趋势和对策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维护政治稳定，巩固祖国统一问题的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应用研究”；“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问题研究”；“少数民族地区人才培养和科技振兴问题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下民族宗教问题研究”等八项，占课题项目的72%强。除了这些国家急需的课题外，人类学家还为国家的民族决策提供咨询，参与一些具体政策的制定，以及制定某些区域性的社会发展战略，并有不少成果发表，高言弘主编的《民族发展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张协堂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体制改革探索》（民族出版社，1988年）、郭正秉主编《云南社会经济情势综合研究》（1987年）等不过是这些成果中的一小部分而已，限于篇幅，在这里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 三

回顾了过去这一阶段的应用人类学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应用人类学的研究比前一时期有一定的进步，即其研究的范围已从民族识别、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变革等问题扩展到了民族地区经济建设与其原有基础之间的关系、商品经济发展对民族文化特点的影响、民族教育事业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关系，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及文化水平的提高、现代精神文明建设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现代化过程中人的问题，以及一些现行发展中产生出的社会问题等范围。如1992年国家社科基金会民族问题组通过的重点课题中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研究；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与科技发展研究；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研究；中国藏族地区现代化发展道路研究；中华基金课题有：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与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少数民族地区乡镇企业发展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研究；我国藏区现代化中的人口问题；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与宗教关系研究；云南边境民族地区毒品问题及其对策研究。1993年通过的

一般项目中有：湘鄂川黔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模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红水河开发与民族问题；在市场经济体系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少数民族地区人才培养问题研究；九十年代少数民族地区乡镇企业发展趋势和对策研究；云南边境民族地区流民问题及其对策研究等。

然而，总的来说还是偏重在与经济建设有关的一些方面，如1993年通过的全国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有14项，其中应用研究有12项，除上述提及以外，还有：不同类型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对策研究；少数民族地区拥护政治统一、拥护祖国统一问题研究；中国各族人口的增长分析与预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多媒体数据库的研究；藏区宗教现状研究。其中与经济有关的有8项，占应用研究项目的67%，全部项目的57%比重是比较大的。由此可见，还有许多方面我们还未涉及和开拓，例如在第十三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科学大会的专题中，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领域是我们还未涉及到的，如“全球变迁与和平展望”、“全球变迁和人类条件”、“作为文化变迁决定因素的旅游观光业”、“水力循环的传统管理方法”、“人口增长、规定食物量的摄取和其他环境因素的影响”、“无声的饥饿：作为人权政策问题——儿童生存”、“争取社会空间：亚洲的性和权力”、“食物习惯人类学”、“食物、贫困和后发展问题”、“中亚和南亚地区族群、迁移和国家的形成”、“族群暴力冲突的文化”、“发展规划与人群的空间移动”、“传统保健系统：社会文化和环境因素”、“乡民文化和全球经济”、“政策、政治和收入财产的危机：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在资源控制和土地占有权方面最近变化之影响”、“人类学和外交”、“人类学与世界商务”、“国际移民中的妇女”、“正规与非正规学校教育：受过教育的人的文化产品”、“娱乐人类学”、“儿童人类学”、“非攻击性行为人类学”、“决策科学：管理人类学的兴起”、“工业人类学”、“在界定和解决健康问题方面应用社会科学观察与研究的地区性合作”、“关于自然科学家、改革制定人和社区人的系统阐述”、“在发展中国家对控制社会腐败堕落现象问题的管理中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墨西哥的农业改革和发生”等。<sup>[6]</sup>此外，我们目前也还没有像维可斯计划或福柯斯计划那样的试验性的发展研究计划。还有，人类学家的研究与民族政策或其他政策的决策之间，还缺乏沟通以及制度化的联系；同时在民族政策和其他政策的过程中，也缺乏更多的发言权。此外，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民族地区也出现越来越多、以前预想不到的各类问题。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中国应用人类学的发展前景是充满着光明和很广阔的，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开放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中国应用人类学的发展，也将在中国人类学家的共同努力下而不断得到拓展，和作出成绩来。

## 注释

[1]《一般杂志》第一卷第4期。

[2]拉德克利夫·布朗著，李右义节译《人类学研究现状》，载《社会学界》第九卷，1936年8月，第75—77页。

[3]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载《边政公论》第一卷，第5—6期，1944年版。

[4]马林诺斯基序，载《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5]费孝通《云南三村序》，载《云南三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6]载《中国人类学学会通讯》第172期。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杜松〕